

论1937—1942年国统区内地工业的发展

孔繁浩

旧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工业设置大都分布在东南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如纺织业在沿海的工厂就占77%，面粉工业占62%，火柴工业占53%，国防工业的酸碱工业全部在沿海。

国统区的内地各省原有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不仅工厂少，而且技术也很落后。抗战开始时，西康、青海、宁夏三省还没有近代工业，以川、湘、桂、陕、甘、滇、黔七省近代工厂也只占有“全国工厂总数的6.07%，占资本总额的4.04%和产业工人总数的7.34%”。①以具体工厂而言，“战前后方较具规模之民营厂家，在四川仅有电厂一，水泥厂一，面粉厂五，纸厂一，机器厂二，陕西有纱厂一，面粉厂二，贵州有纸厂一，江西有机器厂一。后方规模较大之工厂，仅此而已。”②这点工业，在全国来说，真是微不足道，就是对地方经济亦影响甚少。但自抗战爆发至1942年国统区内地各省的工业迅速发展。

首先，从工厂兴建的总数来看：1936年时，整个后方各省，大小工厂只有300多家，其中民营为217家。1943年时，国统区共有5260家工厂，资本总额为4.87亿元，工人有359600多人。③其中，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省工厂最多，成为后方的工业中心，它占后方工厂总数的45.24%，资本总额的52.96%和工人总数的43.27%。④此外，云南的工厂发展也很快，据统计，云南在战前称得上近代企业的只有锡务公司，炼锡公司及跃龙电灯公司等寥寥几家，产业工人仅2000人左右。而在1942年，根据国民党经济部统计，云南的厂矿已经增到106个（其中资本二万元以上者41个），产业工人人数为18049人，在川、滇、黔、桂四省中居第二。⑤以上数字说明，战前近代工业寥若晨星的内地，在战后几年间，确系有了迅速发展。

其次，从工矿企业生产发展的具体情况来看：机器工业，西南地区的一些机器厂原来是无法制造各种工作母机与工具机的。以重庆机器工业为例，

战前只有大小厂十余家，而且技术水平低下，以修理为主，但到1939年8月止，重庆已有机器厂83家，其中最大者为大鑫铁厂与华生电器厂，各有资本50万元，次之为震旦与顺贺两家机器厂。⑥这些机器厂的生产情况也非常好，如以1939年生产的各类机床指数为100%，那么1938年的指数为8.76%，而1940年的指数达277.59%，说明各类机床产量的增长速度是很快的。各类机床的大量生产，就为西南各行各业发展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工作母机与工具机的新装备，因而后方新的工厂不断开设。1938年开了182家，1939年开了346家，1940年开了406家，1941年开了738家，1942年开设了1077家。⑦除机器工业外，矿业在大后方也有较大的发展，如石油矿，1938年4月，在没有任何国外技术援助下，由我国地质专家在甘肃玉门老君庙钻探成功，开发了甘肃玉门油矿。该石油矿，由于广大爱国员工的努力，生产迅速增长，1939年至1945年，共生产原油8,000万加伦，提炼各种油料2,000万加伦。再如铁矿，抗战前，西南地区并无钢铁厂，但在1938年以后，许多重要的铁矿先后被发现，因而一个个钢铁厂拔地而起，到1945年，“大后方已有大小钢铁厂七十三家”。⑧煤矿业，原来内地的煤是很少的，根本不能满足战时工业的需要，但是经过国民党政府和科技专家的努力，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建立新的煤矿，一是改造旧的煤矿，扩充和更新原有设备，这样煤的产量才开始有了大幅度的增长。1938年，四川的煤产量为140余万吨，到1940年达到276万吨，1942年达到290万吨。至于煤矿，到1945年

①《抗战以来四川之工业》，《四川经济季刊》，第一卷第一期。

②国民党政府经济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张宪文：《中华民族史纲》，第532页。

④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02页。

⑤中国现代史资料委员会翻印：《抗战中的中国经济》，第131页。

⑥《经济动员》，第三卷，第六期，1939年8月。

⑦《经济导报》，第二卷，第七期。

⑧《三十年来之中国工程》。

抗战胜利时为止，“内地已有重要煤矿五十三家”。①云南个旧的锡矿，在战前只有48家，战后几年发展到100余家，并且运用新式机器代替老法开采，含锡量由过去的千分之几提高到百分之二左右。云南②南出产的钨砂，也由去年产二、三百吨上升到年产2000吨。金由三、五千两增为1.7万两左右。铁的产量也增加了五倍多。③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轻纺工业，战前尚告阙如，每年要支付一千多万元的外汇购进洋纱、洋布，但抗战开始后的几年，由于“云南纺织厂”和“裕滇纺织”公司的开工生产，产品除80%供应本省外，还有20%销往川、黔。④

大后方的重建和发展，不仅满足了人民生活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增加了国家的财力、物力，加强了国防力量，巩固了后方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抗战事业。因此，国统区内地的工业发展，就成为滋养和保卫我中华民族新的伟大的力量。

二

国统区内地工业发展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抗战前后，沿海工业的大量内迁，1937年8月13日，日寇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这时，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召集上海工商界人士，组成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许多厂方也成立了有关组织，着手进行工厂内迁。结果，上海内迁的工厂只有146家，占1279家工厂的11.4%，运出机器设备14,600吨。1937年9月间，财政部长翁文灏从国外回来，拟定了扩大迁厂的计划，这样至1938年2月，经政府协助迁移内地之工矿，除汉阳钢铁厂及六河沟化铁炉厂外，共341家，机件共重63400余吨，合之汉阳钢铁厂内迁之部分机件共重十二、三万吨之多。在此数内，纺织机件共重31600余吨，机器五金厂机件共重5000余吨，化工厂机件共重2200余吨，陶瓷厂机件共重3400余吨，电器工厂机件3300余吨，煤矿机件共重3600余万吨。”⑤内迁工厂截止1940年底为止，共448家，其中上海、武汉两地就有308家。上述这些工厂迁入四川的为254家，迁入湖南的为121家，迁入陕西的为27家，迁入广西的为23家，其他各省的为23家。⑥从这个情况来看，迁入四川的工厂为最多。其原因，一是由于四川是国民党的陪都所在地，政治上比较安全，各项资源又很丰富，便于开工。二是由于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为了巩固其军阀的地位与实力，对内迁工厂持

以欢迎的态度，并进行了大力协助。如四川省政府曾决定，凡迁川工厂设备由木船运载的，其物资保险费20元由川省津贴15元9角5分以示优待。“到1938年10月底止，四川省政府的协助款项达120多万元。”⑦另外还作了减免迁川工厂地捐税等。这一系列的积极政策，吸引了大批工厂迁入四川。当时迁入内地的所有工厂，如按类别来分：机械厂占40.4%，纺织厂占21.65%，化工厂占12.5%，教育文具厂占8.26%，电器厂占6.47%，食品厂占4.9%，钢铁厂占0.24%，其他厂占3.79%。由于数百家工厂迁到内地，遂使国民党统治的西南地区迅速形成了新的工业基地。

工厂内迁，国民党政府虽然做了不少组织协助工作，如上海民营工厂内迁时期，凡经资源委员会批准内迁的一些机械、电器与化工等工厂，其运费全部由国民党政府承担。武汉地区工厂拆迁时，国民党组织了工厂调整处全面督导与组织武汉民营各工厂迁建，湖北建设厅，负责直属各工厂的迁建。正因此，武汉动员工厂内迁，不仅规模大，而且效果也较好，当时新华日报社论赞扬说：“武汉三镇工厂迁移有很大成绩。”⑧但是，由于战前在思想上、物质上缺乏应有的准备，特别是1933年，马寅初等经济学家就曾向国民党指出过，为了保存经济实力，支持长期抗战，必须及早把沿海工厂迁到内地，以大西南作为根据地。这个正确意见国民党却没有重视，等到最后，日本的炮弹打到厂房里去才去动员内迁，为时实在晚矣！致使绝大多数工厂都未能迁出，有的遭到破坏，有的落入敌手。

第二，由于国民党政府对战时工业加强了领导以及对工矿企业的支持协助。

中日战争是一场大规模的消耗战，其消耗的补充与供给，主要依赖于国家生产的发展。所以，国民党及其要员对战时经济十分重视和关注。如蒋介石曾多次电令以川、黔、湘为主，加紧筹建战时工业，增加后方生产。1938年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还决定将原有的实业部改组为经济部，并公布经济

①《十年来之中国经济》

②重庆《新华日报》，1939年3月19日。

③《云南冶金史》，第172页。

④《经济问题探索》，1982年，第6期。

⑤翁文灏：《一年来之经济建设》，《中央周刊》，1939年新年特辑。

⑥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87页。

⑦《中外经济年报》，1939年。

⑧重庆《新华日报》，1938年10月20日。

部组织法，将经济行政机能重新加以规定与调整，扩大其管理范围，增进其行政效率，从而扩充战时生产力，开发经济资源，以确保战时经济的需要。1938年11月，国民党政府还公布了非常时期工矿业奖励暂行条例，凡中华民国国民在大后方所办有关国防生产重要矿业，实收资本已达必要数额需要辅助者，可呈请奖励。如降低或免除出口税，降低或免除原料税，降低或免除转口税，减低国营交通事业运输费，租用公有地，免除地租，以五年为限等。^①

1940年，国民党召开七中全会，又决定行政院增设经济作战部，并设置战时经济会议，以加强经济行政效率。现有经济部改为工商部，专管工矿企业事宜。此外还决议成立中央设计局，主持全国经济建设之设计与审核。^②国民党政府在政策和行政机构方面作了以上这些调整与规定，这是后方工业所以能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国民党政府具体支持协助内地工业，主要是通过两大机构进行的：

一是资源委员会。这个机构组织最初只是一个调整研究的组织。1936年起，开始实际经营工矿电力企业，此后，经济实力迅速发展，成为旧中国工业发展史上最大的国家垄断机构。该会在大后方国统区掌握了大小煤矿26家，从1936—1945年，煤矿总产量增加三倍，这些煤炭17%供铁路运输之用，67%提供内地工业使用，它是后方所有工厂生产用煤的重要来源之一，1938年起，资源委员会还接办了电气事业，在后方积极兴建电厂，几年间，西南地区包括西康、甘肃边远省份，兴建电厂共有19家，装机容量和发电量均有成倍增长。当时西南各省工厂较多的地区，有一半要依赖该会所属电厂供应电力。煤电两项是近代工业生产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这对后方工业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二是工矿调整委员会。这个组织是1937年9月成立的。1938年国民党政府起用了一批与民族资产阶级关系密切的知识分子，把工矿调整委员会改建为工矿调整处，翁文灏兼处长，以协调国民党政府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对民营工厂的内迁以及内迁后所遇到的困难进行协助。调整处对内迁的民营工厂最重要的协助就是贷款。当时贷款的形式主要有四种，即迁移贷款、营运贷款、建筑及增加设备贷款、疏建及保护工程贷款。以后两项贷款来说，到1941年6月底为止，工矿调整处共发放13,689,600元，其中用于新建工厂建造厂房或添置设备、扩大生产能力的贷款有9,487,605元，接受贷款的工厂共113家。用于新建工厂建造防空设施的贷款共有

4,202,000元，接受贷款的工厂有30家。工矿调整处在战时国家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拿出这些资金解决某些工厂的困难，帮助其扩大规模，发展生产，这不能不是一种积极的支持和协助。

此外，工矿调整处还为后方工厂解决生产技术问题做了不少工作。当时东南沿海地区工厂内迁，正是中日双方交战激烈之时，故随迁的技术工人很少。以上海为例，随厂内迁的技工，总共只有2000多人。“若以战前上海80万工人来比例，那等于320个工人中，只有一个是随厂迁出的，其余仍在沦陷区。”^③这种情况，就造成内地工厂复工时技工奇缺，致使生产不能顺利进行。为了解决各工厂生产上的实际困难，工矿调整处及时到沿海地区如香港、上海、天津、青岛等地招募技术工人，并制订了招募技工的办法，规定由工矿调整处贷给旅费，每人30元至80元，另外还酌情贷给安家费与家属旅费。这个招募消息一公布，大批流失业的技术工人，立即从沿海涌向内地，到1938年底有1793人，到1939年底迅速增加到11,413人，到1940年底已有12,614人。这些技术工人来到内地，很快成为各行各业中的生产骨干。

上述情况可见，国民党政府对内地统治区工业的领导协助是有成绩的，对内地工业迅速发展所起的作用亦十分明显，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

第三，由于各种类型的高级专家，科技人才，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建设事业成功与否，人才科技是个重要的因素。战前，我国受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均集中于沿海一带，内地十分缺乏，故各种建设事业都不发达。但自“七七”抗战以后，高级学府如大学，高级专门学校，甚至中级专科学校十分之八九皆迁到了内地，各种专门人才也荟萃于西南各省。据统计，到1940年4月23日为止，各种应征的专业人员已达1419人。其中矿业为81人，占总数的5.6%，电器业为130人，占总数的9.2%，土木业为372人，占总数的26.2%，机械业为292人，占总数的20.6%，化工业为418人，占总数的29.5%，纺织业126人，占总数8.9%。^④这许多专业技术人员来到后方，对西南的工业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

^②重庆《新华日报》，1938年11月26日。

^①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7月14日。

^③《战后敌后工业与工人的变动》，《中国工运史料》，第二期。

^④《抗战期内技术人员调整之一斑》，《新经济》第三卷，第11期，1940年6月。

作用。譬如水利专家，他们在有关部门的领导下，先后勘测了西南地区四十五条河流，最后在四川的桃花溪、清洲洞、青海的湟水、贵州的修文河、甘肃的天水、西康的东河等地建起了水电站。地质学家经过勘探找到了石油矿藏，并钻探成功，开采出石油。化工专家经过努力，先后研制出酸碱、橡胶、水泥、甲醇、丙酮、电石等一大批化工产品，适应了后方工业的急需。当时后方汽油十分紧张，专家们就从菜油、花生油与烟煤中提炼，还有的利用酒精，经过研制作为代用汽油。为了节省汽油，科技人员还改装了部分汽车，燃烧木炭作为动力。机器工业方面，为了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机械工程师不断改进设计了各种类型的机床，增加了原有机床的精密度。再有，对纺织机械也进行了重大的革新。原来内地基本上处于手工木机状态，后来专家们根据上海棉业实验馆的设备与图纸进行仿制，并投入生产，结果有力地推动了内地纺织工业的发展。

总之，抗战时期，西南内地工业的发展是与各种类型的科技人员，高级专家工程师的努力分不开的，如果没有这些技术专家发挥积极作用，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第四，由于战争形势急剧变化，国民党统治的西南内地逐渐形成了一个较大的商品市场，为民族工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工业的发展，离不开商品市场。抗战爆发后，欧美帝国主义在华工厂倾销商品的压力以及对华商品的输出均有很大削弱，如德国对华出口商品从1937年6月的664万元跌至年底为122万元，到1940年6月出口商品降低到了零度。英国1940年6月比1939年6月对华商品减少了83%。法国也在日期减少了57%。^①由于帝国主义的消费品和奢侈品受到不少限制，原来西南地区被他们占领的市场就腾出来了，中国的资金外流也减少了，这对内地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发展是个很大的鼓励。

另外，战前沿海民族工业产品很多是销往内地的，现在几乎中断了，加上沦陷区的扩大，人口、资金大量移入西南后方，这样，对工业品的需求量就有了大幅度地增长。正在进行的战争对被服、军火、药品、交通工具等的需要也比平时增多，这些因素都是非常有利于内地民族工业发展的。同时，又因抗战初期市场物价上涨不大，这种情况既可为资本家带来一定的利润，又能使资本家产生市场平稳感，从而刺激了民族资本家鼓起经营的勇气，不

断投资企业，加紧扩大生产的积极性。

在探究国统区工业发展原因时，还必须注意的是：首先，不能离开整个中国抗日的战局孤立的说明经济形势。中国内地工业发展主要是在战略防御阶段结束以后展现出来的。在这个时期中，大规模的正面进攻可能性之减少，战局比较稳定，这么一来，迁厂迁厂的现象就基本告一段落，已迁入西南地区的工厂亦就较顺利地陆续开工，许多资本家，甚至华侨也到内地投资设厂。^②这些事实说明战时国统区工业之景气与国内整个战局之推移是息息相关的。其次，不能离开整个国际政局，特别是不能离开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个环节。欧洲大战之爆发，特别是英法对海面上实行封锁以后，整个世界市场，显然起了很大的变化。在这里，我国一些入口的生产工具固然感到困难，但是我国一些出口品，特别是锡、钨，因为战争之关系，在世界市场上更显出其重要性。而同时，因为英镑对美元之贬值，因为国际金融市场之动荡，促使一些曾经把法币换成英镑而把资金存在伦敦或香港的人，重新又把英镑换成法币，把资金流回本国，形成法币外汇回翔和公债市价之好转。

抗战时期，由于工厂内迁，从而使国民党统治的内地建立了新的工业基地。而国统区工业的迅速发展，又为支持我国人民长期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国统区工业发展的前景不长，只是一种短暂现象，到1942年已发展到了顶点。1943年工业生产就明显发生困难，并日益陷入了危机。以重工业中心重庆而言，1943年，全市871家工厂中，停工减产者即达270余家。衡阳是仅次于重庆的又一工业中心，据1943年11月的估计，到年底将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工厂要宣告结束。内地工业发生了危机，其原因最主要的，即抗战时期的国统区，外国资本（主要是美国资本）并没有停止活动，它们继续控制着中国财政经济命脉；国民党财政日趋困难，通货膨胀越来越甚，致使各个部门受到了沉重打击；国民党的苛捐杂税繁多，使内地工业难以承受。由此可见，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在某种条件和因素的刺激下，虽然有时也有所发展，有所前进，但是要保持长期稳定的发展，显然是不可能的。

^①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6月14日。